

燃油税已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

【财经纵横之徐冰专栏】

在燃油税的诸多好处之外，有一个坏处也是现实的——当前情况下开征燃油税，很可能增加消费者负担。逐渐醒过神来的舆情，很形象地演绎了由大声叫好到一片质疑的转变过程。

最新的进展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773位车主23日“联名上书”国家发改委，请求先给成品油降价，再讨论燃油税的开征。而来自国税总局的消息则是，燃油税费改革会和成品油价格下调同时进行，且不会拖到明年（11月24日《北京晨报》、《上海证券报》）。国税总局的态度，也许更多代表了决策者的倾向性意见，消费者的支出增加，也恐怕真的不会拖到明年了。

就理智以及用车公平而言，1773位车主不会盲目反

对燃油税。这一次“联名上书”，其意就是想把已经箭在弦上的燃油税给搅黄了。最现实的利益在于，不先降价而热衷于开征燃油税，这实际剥夺了消费者享受降价的权益。或者说，是否开征以及如何开征燃油税的讨论，已经被利益方所利用，暂时不降价以及等待明确指示，实际成为尽量维持眼前高收益的借口。因为按照目前实行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在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且已持续数月的前提下，中国早就该降价了。有报道说，成品油迟一天降价，石油巨头即可多赚3亿元。但中国的油价不仅迟迟不降，却反而热火朝天地讨论开征燃油税——以目前情况判断，即便燃油税和成品油降价同时进行，消费者支出增加也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中国不太可能比照其他国家，在燃油税上实行高

税率。可即便30%的低税率，在目前油价下降的情况下，消费者每升汽油至少也要多支出0.5元。国际油价已经跌破每桶50美元，中国汽油零售价已比美国高出50%，就算是降价的同时推出燃油税，也无法回避这样的抱怨——取消费路的损失，又靠燃油税给赚回来了。所谓吃小亏，却赚了个大便宜。

很明显，这就是让消费者极其恼火的地方。无论是燃油税还是石油巨头的零售价格，都在消费者钱包上斤斤计较。而如此算计之下，哪怕燃油税自身的公平性显而易见，哪怕消费者其实并不反对燃油税，现实的利益得失，也必定使得消费者很难认可燃油税真的择到了机。恐怕，择到机的恰恰是税加费——名目繁多的过路费依然存在，而它们，实际是用车消费的大头。

发改委说，一旦开征燃油税，将同步取消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输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输附加费等六项收费，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收费站恐怕也要撤销。可这样的改革与其说力度大，不如说加剧了人们对收费名目繁多的怨愤。即便没有燃油税，二级以下公路收费也是原本要取消的。除了养路费，其余的五项收费，对于绝大多数开车人来说，则几乎根本不知道。

人们原本已经麻木，甚至已经自行消化了的收费，这一次再被郑重其事地拎出来，所谓旧恨未去又添新仇，一个看上去很美的改革，正常的讨论却以消费者蒙受损失为成本，如何算是择到了机呢？那1773位车主的诉求，确实说了出大家的心里话。

(作者系《中国经济时报》编辑)

■第二落脚点

对于燃油税率问题，我的看法是：燃油税改革不管如何改，都应当遵循一条基本原则——不增加民众的税费负担，不提高车主的总体（平均）用车成本。换言之，应以政府不多收钱为原则，政府不应利用燃油税改革谋取更大、更多的利益。

必须明确的是，我国即将开征的燃油税，其税率与其他国家没有可比性。近来不少人谈及国外的燃油税率，较低

燃油税当以“不增负”为原则

的如美国为30%，较高的如日本达120%。言下之意，我国的燃油税率若确定在30%至50%之间，算是很为老百姓着想。这种论调纯属赤裸裸地糊弄人。美日等国的燃油税，几乎是政府面向车辆征收的唯一税费，车主除了缴纳燃油税，不再交过路费、过桥费，更不知“养路费”为何物，甚至时时能享受到政府免费提供的路边停车位。而我们呢？燃油税仅仅取代了原本就不伦不类的养路费而

已！可对大多数车主来说，每年支付的路桥费远多于养路费，养路费只是个小头。这种“半调子”燃油税，其税率根本没有资格与国际接轨。

如果政府无意通过燃油税谋取更大利益，那么燃油税率的确定就变得非常简单：拿现在各地每年公路收费的总额，除以全国的耗油总量，所得到的数字，就是每升油应该附加的燃油税额。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果

燃油税率定得过高，变相增加民众税费负担，无异于竭泽而渔，对车主、企业、经济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我们不希望轰轰烈烈搞了十多年的燃油“费改税”最后被扭曲成“费加税”。如果政府要向社会表明燃油税改革确实是為了公平，为了节约，为了环保，那么就不应该利用燃油税改革之机谋取更大利益，这是政府“自证清白”的最佳方式。

(晏庆盛)

■第三只眼

燃油税改革不会拖至明年，并且要与油价下调同步进行，这也就意味着国内成品油现有价格会一直延续到年底，也就意味着消费者将继续为高油价埋单一个多月，这无疑是很不合理的。

其实，油价下调是一回事，开征燃油税又是一回事，

二者并不存在必需同步进行的内在关联性，在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的情形下先下调油价，并不妨碍燃油税改革的讨论和推进。先下调油价，消费者就可以较快得到实惠，尽管推出燃油税之后油价会上涨，但养路费等费用的取消可以进行弥补。所以，先下调国内油

价，再顺势推出燃油税，才是最公平的方案。

国内油价迟迟不下调，说到底既是强势利益集团不愿放弃高额利润，也是因为油价调整的话语权在石油巨头和主管部门一边，与此同时，作为利益相对方的广大消费者，却被排除在油价调整的决策程序之

外。唯有建立健全成品油定价机制，在民生商品价格制定与调整中纳入消费者代表，让他们参与到博弈中来，才会有公平的价格制定与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油价迟迟不下调体现的利益落差，实际上也就是有关部门权力与消费者权利之间的落差。

(魏文彪)

谁说燃油税要跟降油价同步走

二者并不存在必需同步进行的内在关联性，在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的情形下先下调油价，并不妨碍燃油税改革的讨论和推进。先下调油价，消费者就可以较快得到实惠，尽管推出燃油税之后油价会上涨，但养路费等费用的取消可以进行弥补。所以，先下调国内油

价，再顺势推出燃油税，才是最公平的方案。

国内油价迟迟不下调，说到底既是强势利益集团不愿放弃高额利润，也是因为油价调整的话语权在石油巨头和主管部门一边，与此同时，作为利益相对方的广大消费者，却被排除在油价调整的决策程序之

外。唯有建立健全成品油定价机制，在民生商品价格制定与调整中纳入消费者代表，让他们参与到博弈中来，才会有公平的价格制定与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油价迟迟不下调体现的利益落差，实际上也就是有关部门权力与消费者权利之间的落差。

(魏文彪)

免费高中“先贫后富”是公平的顺序

■热点纵论

同样一片面包，对于一个饥饿的穷人和丰衣足食的富人来说，其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提供的免费高中义务教育，就是这样一片面包。

11月23日的《中新网》报道，新疆区委书记王乐泉23日称，新疆相对贫困的和田、喀什、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三地州将率先实行高中阶段免费义务教育。在此基础上，力争2015年在全疆基本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王乐泉进一步表示，要继续完善城乡义务教育和经费保障制度，加大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倾斜力度。

虽说之前已经有一些省市在酝酿12年或者15年免

费义务教育，但真正付诸实践和给出明确时间表的，新疆是第一个。新疆实践会不马上形成鲶鱼效应，值得期待，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新疆推行12年免费义务教育“先贫后富”的顺序，因为，这一顺序最大程度契合了免费教育的公平理念。

12年免费义务教育是个好东西，但寄希望于全国范围内统一实现，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毕竟，各地面临的实施条件各不相同，进度自然也会有所差异。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同样也是如此：财力有限，同时实现12年或15年免费义务教育不切实际，只能有选择性地让部分地区先走一步。如此一来，就有了方向性的选择问题。在我看来，让贫困地区率先延长免费义务教育时间，是

最公平的选择，因为弱者永远更需要国家的帮助。

由政府提供的免费义务教育，是一种公共福利，对于比较贫困的家庭来说，它更是一种事实上的国家救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是，同样的教育费用，对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和比较贫困的家庭来说，其形成的负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前者，或许只是意味着多增加了一笔开支；对于后者，则可能就是无法承受之重。而最大程度地保证贫困家庭的孩子不因贫失学，恰恰又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此一来，由政府提供的高中阶段免费教育向贫困家庭和贫困地区倾斜，就是教育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新疆的实践，给了教育公平一个明确的方向。

政府最大的作用之一，就是通过财富的重新分配促进社会公平，而免费义务教育，又是一切公平的起点。对于延长免费义务教育时间来说，从一些地方的计划酝酿和新疆的实践来看，要不要推行已经不会有什么争议，如何推行才能最大程度体现公平，才是决策者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各地在延长免费义务教育时间的推行过程中，“先贫后富”应该成为一种固定思维，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比如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先投入贫困地区的高中免费义务教育）等手段，让国家救济能够集中力量，先帮助有迫切需求的弱者解决燃眉之急，如此，延长免费义务教育，才能在最公平的轨道上一路走好。

(本报评论员 赵勇)

药品采购价黑幕让人寒心

■公民发言

药品采购价高于中标价60%，这样的反差令人难以理解。因无力改变医院药品采购价高于中标价等不合理现象，河北邯郸磁县医院工会主席李信决定辞职。

(11月24日《燕赵都市报》)良心未泯的李信终于忍无可忍，演绎了一回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而这一切，恰恰是在强大利益集团的压迫下一种无力的反抗——报道说，

多年来，李信不断地将自己发现的问题向医院和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但都没有什么改变。

报道称，“医院药品采购价大大高于中标价”已经是一个常态了。对此，我想作为磁县医院的一院之长，应该是了如指掌。那么，药品采购怪象的包袱皮里，到底藏着些什么货色呢？厂家要5块，医院愿意给10块，天下哪有这样的傻瓜？李信曾向有关人员咨询过药品的采购价为何高于中标价，得到的答复却是：“太

相信药品经销商了，人家开多少钱的票，我就给人家多少钱。”这简直是骗人的鬼话！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那高出的钱，实际上被买、卖双方的有关权利人私分了。而最终养肥这些蛀虫的，无疑是众多承受高药价的患者。

诚如新闻所说的那样，当前，药品价格普遍偏高，并不完全是因为缺少相关法律法

规，而是监管部门部分工作人员与药品产销企业和医院建立了事实上的利益联盟。正是这个利益同盟，不断制造着采购价高于中标价的怪事，让老百姓陷入“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现在，这个利益同盟还逼走了一个欲还原真相的医院工会主席。李信的无力感，何尝不是现行医疗制度的悲哀？

(张兰英)

投稿电邮:wfwcbxyh@vip.sohu.net
电话:025-84783646

别老用“假新闻”来试探舆论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这两天有两则“新闻”引起了人们的公愤。一则是《京华时报》报道的，由于无人愿意接手中国足球这个“烂摊子”，谢亚龙将继续担任足协专职副主席职务。还有一则是，曾因派警察进京拘传记者而丢官的辽宁西丰原县委书记张志国近日履新了，职务是沈铁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副总指挥。

谢亚龙留任四年，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中国足球重病缠身，他绝对逃不了干系，必须对此负责。谢亚龙不辞职，已经让人无法容忍，如果体总再留任谢亚龙，那简直就是强奸民意。所以，这一爆炸性新闻一出，网上笑骂一片，简直是怒不可遏。幸好，有关方面迅速出面辟谣：“谢亚龙留任属不实报道”，暂时平息了一场舆论危机。同样，网民们在获悉张志国履新一事后，纷纷惊呼，有人干脆猜测说“张志国后台很硬”，乱纷纷，莫衷一是。同样令人欣慰的是，据新民网11月24日独家报道，铁岭市委已通过政府网站发出正式公告，张志国履新一事不属实。

这两起让人难人接受的“新闻事实”，纷纷宣告落空，我们与其说是对“假新闻”愤怒，还不如说为这样的“新闻”是假的而庆幸。这样罔顾民意的人事任命，如果成为事实，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不过，欣慰之余，我也不禁狐

疑：怎么会有这么多不靠谱的“假新闻”？媒体如果没有把握，怎么敢如此信口雌黄？这样的“假新闻”，怎么就像真的一样？人们对这样强行逆民意而动的“任命”，虽然觉得不可理解，但并不认为“没有可能”，这说明了什么？

这背后大有玄机。敏感人物的人事任命本来就不是小事，媒体如果没有可靠的信息源，是不敢随便“通报”的。因此，说这两条新闻是“根本没有事实依据”的“假新闻”，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更大的可能是，这同样是有关部门现在乐此不疲的“舆论试探”。

“舆论试探”的做法大约是，想做出一项决定，却又没有把握，就直接或间接地向媒体透风，让媒体报道。如果舆论反应正常，那就顺势而为，一旦发现舆论反应激烈，那就断然否定，让媒体背黑锅，说是假新闻。

其实，无风哪能起浪，偶一为之，倒也新鲜有趣，表现了有关方面重视民意的理念。但“舆论试探”也一定要尊重传播规律，更要尊重媒体。媒体的社会公信力是其最大的社会价值。如果媒体被“舆论试探”反复利用，那么，其形象必将蒙污，其公信力也会大打折扣。到时政府通过媒体发布的一些消息也没人相信，那就弄巧成拙了。

(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选李宇春还是选唐伯虎？

【中国观察之乐毅专栏】

公元2008年，又见新科举。历时4个多月的湖南株洲市“80后”优秀青年干部“海选大赛”落下帷幕。比赛共计7000多人踊跃报名，采用了类似“超级女声”的竞争方式。整个考场全开放，株洲市政府认为本次海选不是作秀，并拟将此形式打造为选拔人才的长效机制。

(11月24日《中国青年报》)虽然主办说法，使用电视手段可以保证“海选”过程公开，确保公正。但非也非也，这并不是选举超女李宇春，而是在选拔解元唐伯虎。

新闻中说，经过推选、初试、复试(难度较大的笔试)，剩下的30名选手进入电视直播的最后决赛。“现场评委组除了领导、专家外，还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人大代表、企业代表和政协委员)，另外还增设了一个公众评委团，由‘80后’代表、归单位代表和社会知名人士代表组成，总人数为20人。”而网络投票结果不参与最后评分，仅为参考。这个选拔的流程，与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乡试、会试、殿试，实在是有着惊人的相似。

选举与选拔，虽只是一字之差，却有着本质的不同。选举是由下而上的，最终权力在民众手中。选拔却是由上而下的，最终权力在“上面”手里。

选举虽然也有很多组织、运作方面的技巧，甚至也有丑陋的

一面，但民众的感受，始终是被选举人种种行为的考虑轴心。而选拔，无论穿着怎样漂亮的民主程序马甲，讨得“上面”的欢心，依然是被选举人一切行动的指南针。极而言之，选举和选拔都会有被操纵的危险。但操纵选举的难度，远大于操纵选拔，因为民众数量极为巨大，利益与思想又极为分散，这使得无论是收买还是长期愚弄他们，成本势必都会极为巨大。而操纵选拔则容易得多，以株洲市此举为例，首先，“上面”可以选择专家评委和公众评委，只用与“上面”保持一致者。其次，那几十名专家评委和公众评委，无论是利诱还是威吓，要摆平其中的多数，相对而言，并不是多难的事。

我其实无意批评株洲市的官员，联想起来闹得沸沸扬扬的80后厅级官员风波，再忆得前不久被“双规”的原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曾对自己的老师掏心：“我没有背景，能够升到这个位置已经到顶了。”我愿意相信株洲官员所言，此举的目的是“使最优秀的人才获得最宝贵的‘初始提名权’”。毕竟，一个公认的历史事实是，科举选拔制度要优于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官员推荐制度。一个官员能在自己权力允许的范围內尽力而为，还是应该得到尊重的。所以，我愿意说，“海选”青年干部是一种进步。只是，在公元2008年，还要谈论这种进步，多少令人有点悲哀就是了。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请马明哲们也做个降薪姿态

■公民发言

上市公司亿阳信通发布公告，决定实施节支计划：包括公司董事长、总裁、董事会秘书等在内的7位高管月薪统一下调20%。下调后，公司总裁任志军的月薪由5万元调至4万元。

(11月24日《北京商报》)任志军的月薪从5万元降至4万元，也就是年薪从60万元降至48万元。相比而言，48万不过是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先生的3天工资——据2007年中国平安年报显示，马明哲每天的收入达18.12万元。针对舆论对“天价高薪”的指责，马董曾表示说：“董事会会根据我的表现给我薪酬。我不会像王永庆那么伟大，不领薪酬，因为我不是老板。”应该说，马董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6600多万元年薪的确令人咋舌，但与2007年平安业绩增长104%、净利润近200亿元的显赫业绩相比，马董的天价年薪是没什么好吃醋的。何况马董的钱拿在实处，没搞暗箱操作，汶川大地震时，他更是一把捐出了一年的收入。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请求马明哲们也能像任志军那样做个姿态，把自己的薪水适当降下来一点。且不说在经济危机的形势下“高管主动降薪”也是与国际接轨”，即便从中国国情、从平复舆论怨言的角度出发，马董也该明白点“明哲保身”的道理。现在，平安的股价已跌得不轻了，到24日收盘时已在23.25元，而你还记得2007年年底的股价吗？那时候是在110元上下，股价坐了这么大的滑梯，你还在6000万元的高薪上硬挺，好意思吗？

(衡外)